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三期 ——
(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3b)

【亡灵祭坛】一代医界巨星颜福庆的文革遭遇	继 前
【冷暖人间】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	江小燕
【往事追忆】文革三年	赵焕焱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中“三结合”的台前幕后	关海庭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一代医界巨星颜福庆的文革遭遇

• 继 前 •

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原国立上海医学院（列年沿用校名：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均简称“上医”）的校友，尤其老年校友，若看到《传记文学》2003年七月号494期“杏林史话”栏中〈我国现代医学的泰斗颜福庆、朱恒璧——兼记上海医学院的创建与消失〉（以下简称“泰斗”）一定会专注读完。

怀着对母校的一切、尤其是对颜、朱二老的深厚缅怀和无限感念，看着、读着，时而不得不停歇一下，抬起头，强忍盈眶热泪，但还是好几次夺眶而出，湿了衣襟！岂不正如日本某音乐家所说：“听无锡阿炳师傅的《二泉映月》是要跪着听的！”那样，触发了多么深沉而由衷的感受！

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过内战劫难，上海百废待兴，同仁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颜老多方奔走，争取到与附属医院（现华山医院）毗邻的周家花园划归医院；园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是闹市里的一块净土。年逾七十的颜老在启用大会上说：“大家能使用周家

花园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化，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他的计划是：除了供复健病人散步、运动锻炼外，还可供教职员工中午在此用膳、午休，也可以用花厅作学术会议的场所，或作聚餐之地“。体现出他老人家不但对医学教育、对上医的基建工作、对任何事物都认真有加，而且充满深厚感情。

颜老总是带头响应共产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积极投身于共产党的宗教“三自”政策，是上海市在这方面的领头羊。遗憾的是，如此天真的赤子之心最终换得的，竟是在“泰斗”文中转引的颜老后辈的血泪哭诉！

年高失忆、重听、讲错话是常事。有时颜老参加市里的会议后，在全院大会上传达，结束前对着扩音机，把常规性口号喊错！把“共产党”万岁喊成“国民党”万岁！这可是不得了了“反党、反革命”！至少可加上“思想极右”的罪名！幸好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是由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长陈同生兼任，他十分了解知识份子、了解颜老，说：“颜老的大节是好的，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就这样，在“反右”斗争中，保护过关。尽管《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校内党干已磨拳擦掌、蓄势待发，而且人体解剖学齐登科教授在学院大门口、最醒目处贴出篇幅特大的巨无霸大字报〈裴多斐俱乐部〉，矛头直指民主党派，作为当时“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颜福庆所处形势之险恶，今天回忆起来尚不寒而栗！要不是陈同生保驾，颜（副）院长无疑会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

在上医几十年的经历中，陈同生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他平易近人、谈吐儒雅而幽默、关心群众而又办事认真；他十分尊重颜老，但凡重要事项，尤其在上医的发展规划、基建项目和科室设置方面，都认真听取颜教授的意见，周密思考、反复深入讨论后才作决定。就是这样一位受知识份子信赖的好领导、好朋友，在文革浩劫中却受到残酷批斗，冠以莫需有的罪名而死于非命！

文革浩劫中，在那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日日夜夜里，颜老受到的苦难、折磨实罄竹难书！他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戴上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令他领头列队在校园内游转，让他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边走边敲，还要不断喊叫：“我是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一——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一——牛鬼蛇神！”紧跟在颜老后面的是七、八个在前政府中任过卫生官的教授，同样戴高帽、敲畚箕、喊骂自己。一次，竟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臭墨汁往颜老头上浇，淋得从头到身上的衣、裤、鞋、袜都墨迹班班！

在颜老诸多罪状中有一条是：“医学界的武训”，说他“为了办医学院，恬不知耻地向洋人讨钱”，斥之为“这和叫花子有何两样，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事实是，一如“泰斗”文中所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医事全被外国教会和财团把持、控制，颜福庆本着民族自尊心，为了筹建我国第一所完全由国人自办的现代医学教育机构，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热诚爱国的医学专家，踏上了筹建的不归路。不言而喻，办事要经费，颜福庆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国内，并向国际集资；几经波折才最终办成能与美国洛克斐勒财团在北京办的高质量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平起平坐的国立上海医学院！这难道应该批判吗？荒谬绝伦！与此同时，经与外国人在华组织的“中华博医会”数度斗争，颜老于1915年组建并成立了中国人的“中华医学会”，被选为首任会长，同年创刊《中华医学杂志》，把医事自主权牢牢掌握在国人手中，从此扬眉吐气，不再仰洋人鼻息、听其发号施令。

本来身体很健旺的颜老，经过多次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凌辱，日渐体衰力竭！但是批斗的次数和力度并未因之而有所减少。家人搀老人去承受批斗，一路上少不得挨辱骂和突如其来的推打、冷拳。家人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折磨，会寻短，多方作宽慰；他却出人意料地

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没什么了不起，以前在湖南早就看到过‘痞子运动’，这次是一样的，革命么，过去了就会好的。”甚为豁达，看得开。

即使工宣队把他禁足在他的卧室里，不准家人进出，使他完全与外界隔离，在上厕所恰与家人照面时，还是点头招呼、露出笑容。

但是，在他因精神和身体长期受折磨，所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得不到及时治疗，引发严重肺气肿而呼吸困难时，家人送他到当初他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就诊，却遭拒之门外，不给入院，而且连稍为贵些的药都不给，马马虎虎看了看，打发回家了事；家人向医院商借氧气筒，以便在家里应急用，却遭一口拒绝时，老人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紧闭的双眼流出了眼泪，此时此刻，他失望、他沮丧、他伤心欲绝！

造反派、工宣队在上医院部会议室的柜子里翻出一幅原本挂在墙上、引以为荣的颜福庆和毛泽东在筵席上的照片，惊奇地议论起来，为什么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会和这老头子一起吃饭？有人说会不会是假造的？后来弄清楚是在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以前，毛接见知识份子代表时所摄，而颜老之所以被安排在毛右侧首席，是因为早年在湖南长沙的颜医生曾诊治过毛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该算是没忘故人吧。但是，这并不能挽回颜医生在由毛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荼毒。

从上医的编年史上推算，颜福庆当年作为湖南长沙外国人办的医院中的一名外科医生，在应毛之求，给杨开慧诊治之时，他脑海中正翻腾、酝酿、筹划着国人自办医学院的巨浪、鸿图；而在作毛泽东座上客、举杯祝酒之际，正是颜老经多年奋斗、宿愿初偿、上医欣欣向荣之时，是为上医和颜老的黄金岁月！他又怎能料到快半个世纪年后自己会成为今古狂人的狂妄思想的牺牲品，成了阶下囚！

当他痛苦地喘咳着，躺在中山医院急诊室的担架上，遭拒绝入住病房、又得不到治疗药物而失望、痛苦、伤心欲绝时，他脑海中能不浮现出1937年4月由他主持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在那次冠盖云集、热闹非凡的庆祝大会上，他在演讲中强调“普及医学卫生”的宗旨，要求上医毕业生不私人挂牌开业，走他倡导的“公医”之路，让人人不论贫、富都享有医疗、卫生之权；几十年来老人家身体力行，夙夜不懈地实践着，而且教育、带领着全体“上医”人塑造了一种无形的服务人群的清风、正气，在神州大地上开花结果。然而，在“文革”浩劫中，却敌不过那股妖风、邪气！在饱受屈辱的晚年，竟没有一个得他恩泽的学生被允许为颜教授服务！

颜福庆教授的后人这样记录颜老最后的岁月：

“‘文革’前，祖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连走路都不要人搀扶，除轻微‘老慢支’外没什么病。1968年，经过两年多‘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祖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留着老长的头发和胡子，与前判若两人，家中大门两旁涂满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颜福庆’的大标语。那时上海第一医学院两派红卫兵造反派正热衷于打派仗，祖父则被逼着写检查。

祖父耳聋眼花，无力举笔，而那时我父亲正被关在‘牛棚’里，于是我成了代笔者……由于我当时耳听手记，使我有机会了解祖父不平凡的一生。那时我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狗崽子’，祖父被勒令去受大会批判，我扶他进会场，少不了挨唾沫和冷拳。……

1968年秋冬，工宣队进驻我家，对祖父实行隔离审查，于是祖父的居室成了禁地！

……从室内传出谩骂声、口号声、朗读语录声不绝于耳。夜深人静听到祖父的咳嗽声和上厕所时的满跚脚步声、我心如刀割。

1968年年底，我被分配到苏北，临行前要求向老人家告别，总算见到数月不见的祖父。他比以前更憔悴，蓬散的白发和长长的白须，面目全非！在虎视眈眈的工宣队的监视下向老人家道别，我说：‘爷爷，您要保重’时热泪夺眶而出。

有一次他犯病时竟被他当初创办的中山医院拒之门外！那是一个妖颠倒的年代！

1970年11月29日，祖父闭上了眼睛，一代医界巨星陨落了。”

“文革”结束已近三十年，颜老尸骨已寒，时光的流逝冲淡了人们的记忆；除上医的老年校友外，很少还会有人记得我国的医学界曾出过这样一位以国人的健康为己任的伟人。颇为讽刺的是，却有人记得颜院长的住房！抗战胜利后，上医复原重返上海枫林桥畔旧址，颜老为了便于工作，紧靠着上医建造了私人寓所，也就是文革中他被禁足在内、承受批斗的那所伤心屋！十几年前，自我放逐有年的颜家人返里，那些记性特好、思想敏锐、行动快捷者，少不得作“黄鼠狼拜年”式的访问，并以统战口吻建议颜老的家人，将老人在世时的住房捐给上医，以示颜老院长对上医的热爱和眷恋有始有终云！

□ 原载《民主中国》

~~~~~

#### 【冷暖人间】

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

• 江小燕 •

（原《书屋》编按：文革当年在上海，曾有一位年轻奇女子，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唯因为这位奇女几十年来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隐姓埋名，故其义举长期隐藏在历史的暗箱中。如今终于真相大白，特转载这一奇缘的往事脉络，以飨读者。

江南奇女今犹在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传》及拙文《傅雷传编辑札记》均谈到当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的一位年轻奇女的义举，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但这位奇女几十年来却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姓埋名，其义举详情鲜为人知，其真名实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这实为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来信告诉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与胞兄傅聪先生相聚回国后，赴上海寻访这位恩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职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谈到了他与江小燕会见的情况，嘱我与她联系。

今年年初，江女士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冷静平实的心态详细谈述了她因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及上书招祸的经历，同时更正了某些误传的情况，读之令人心动，感叹不已。现征得江女士同意，特将此信借《书屋》一角发表以飨读者，以彰后世，以励后人。

余开伟）

※ ※ ※ ※ ※

致余开伟先生

江小燕

余开伟先生：

您好！谢谢您寄给我《傅雷传》，迟复为歉！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个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

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本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未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

第一，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

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的举动（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我并未“入狱”。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迫，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也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而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接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也许情况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反特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刀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

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太，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此的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与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我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的，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会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因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移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再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只能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迫害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



单的。

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误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

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谢谢您寄给我名片，可我从未印过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贺个早年并祝

文祺

江小燕

1998年1月23日晚11点40分

□ 原载《书屋》

~~~~~

【往事追忆】

文革三年

• 赵焕焱 •

◇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狂飙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载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新闻层出、新名词不断涌现、而且被不断刷新的年代，我将偏重回忆不被注意的民间情况，以避免政治斗争的叙述重复和这段民间历史的失传。

街名是首先被列入革命的对象之一，红栏杆街的路名有先见之明，领衔的“红”字幸运地被公认留用，改名为红街，有点王菲歌名的风格（“将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旋木”是“旋转的木马”；“美错”是“美丽的错误”）。但是当时尚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其它地方也出现了冒牌的红街，送信就有了问题。红街还算是幸运的，有的街道被“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地改了许多名称，东面街牌和西面街牌的上面被贴上毫不相干的名称，气魄都很大，例如“红全球街”和“全无敌街”并存，使人无所适从。

“破四旧”的学问就更多了，每个家庭都全方位地把以前一切文化痕迹扫除干净，许多文物也毁于一旦，我在1965年看过的书全部属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列，几乎成了禁书，再看只能一个人暗地里看了，连我经常翻的《外国名歌200首》也被作为禁书，1969年被农场收掉。当时有聪明人用“革命书籍”的封面包喜欢看的书。

人们的衣着必须规范，不能有小裤腿、尖头皮鞋和花俏的打扮，许多小裤腿被毫不留情地剪坏。

1966年8月23日，上海开始进入“红色恐怖”之中。开始是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作为第一代“牛鬼蛇神”受冲击，戴高帽子游街，扫街等被监督劳动。第二波

是曾经的资本家被抄家，他们的家里被任意搜索，财产被任意带走。有的家庭自己把黄金制品扔掉，我家附近的垃圾箱里就有过金戒指。这时候偶然性很强，红卫兵觉得有理由就可以进入任意一个家庭抄家。在若干年后“落实政策”时，归还“抄家物资”也是内容之一。

许多“牛鬼蛇神”被剃了“阴阳头”，就是一半光头、一半有发，对女性头发作处理也是毫不含糊的。

红卫兵由北京学生发明，佩带毛泽东的手书“红卫兵”袖章，最初只能由“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店员）的子女参加。在血统论的统治下，开会发言前先要报家庭出身的成份，如果不是“红五类”的就会被轰下。当时有一付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黑五类”子女为了和发动父亲或母亲划清界线，许多人甚至宣布脱离亲属关系。后来出现了一些红卫兵领袖，当时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聂元梓和蒯大富。聂元梓“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地位和现在的版主不可同日而语。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是一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也就如现在名牌企业商标、商号的无形资产。

“把斗争大方向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阶段产生了登峰造极之作，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南下，带来了军服热和皮带文化，皮带的使用是以后武斗的前奏。当权者遭受批斗是中国历史空前的，他们在后来还要受皮肉之苦，除了没有剥夺生命，差不多象法国革命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一样了。

军服皮带上的扣子也非比寻常，可以产生好莱坞大片《耶稣受难》的效果。

法国革命时代出现的“保皇党”也复活了，当时对不“革命”的人就以“保皇派”相称，鄙称“老保”。

上海市明德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谭真是女士，1967年2月2日的斗争会（当时的“保皇派”后来称之为“2.2丑剧”）上，她在台上被拳打脚踢。校长杨淡仙也是女士，她感慨“怕苦而不怕死”，后来也成为对抗毛泽东对战士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罪名。

全国出现了无数《红卫兵报》，民间出版业兴旺发达，加上写大量大字报的需要，纸张的需要量急剧上升。如果在现在，纸张概念的股票肯定是大涨了。在显要地方张贴的大字报会很快被复贴而刷新，就如我现在发帖的遭遇差不多。

在北京红卫兵到全国串连的示范下，全国出现了“革命大串连”，在全世界开了坐火车、乘汽车、电车和进入公园、博物馆等参观、观光不化钱的先河，各条铁路线挤满了学生，有的车厢人满为患，以致有男、女生就地小便的情况发生。如果不买另食，可以认为已经进入了低标准的共产主义，因此我不大需要花钱。这个时期没有发生大事故和案件应该说是个衍生奇迹。如果把我当初在北京一个月的消费按照现在的费用来清算，那不会是小数目。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壮举把最胆小的学生也吸引了出来，“大串连”运动走向了高潮。我在金秋10月到了北京，住在德胜门附近的关厢的一所学校里，我每天吃米饭和馒头，菜是天津大白菜和肉丝，那时是盆柿上市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硬的柿子。我出发去看大学的大字报，同时也游山玩水，一切都是免费的，我到过凡是知道的地方，包括看香山的红叶。因为若干年以后我多次到北京，现在已经无法区分出哪些地方是我1966年去过的，留下佩带袖标的照片只有在白塔公园的白塔前照的。在那个非常时期，却没有听到过有刑事案子发生，不认识的人都相处很好。我记得是10月26日那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我在疯狂的人群中看到绿色

的吉普车对缓缓驶过。在之前等候的时间里，高音喇叭里不断播放着毛泽东语录歌。在北京，我第一次看到了“挖出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离开北京以后，我也到过其它地方，不少地方有儿童站岗，我必须回答毛泽东语录才能够通过。当年出现了一批背诵天才，能够把《毛主席语录》完整背出来，这本书被西方称为“小红书”，用红的塑料做封面，再版时由“伟大的副统帅”林彪作“再版前言”。关于林彪，以后会专门提及，他充当了当时个人崇拜的总导演。

在任何会议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朗读《毛主席语录》，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选择领读自己感到有利的语录，以至出现巧妙的语录战。《毛主席语录》分若干专题，第一条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语录编成的歌后面还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无伴奏口号。

全国出现了“红海洋”，就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作为政治广告发布阵地，基调是红色。每个弄堂和家门口写上毛泽东的诗词对联，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油漆概念股也开始上涨了。

所有的人都佩带了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大小、材质、画面不一，有的人收藏了许多款式，甚至听说有人把像章别进皮肉。后来毛泽东本人发出“还我飞机”的感叹，因为像章都是用铝制作的。周恩来一直佩带着一个小长方章，现在可以从当时周恩来的照片中看到。

在全国一切地方实现了“早请示、晚汇报”。人们聚集在有毛泽东画像的地方，由扮演领颂角色的人先领读“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是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在“早请示”中谈一天的工作计划，在“晚汇报”中总结一天的工作，最后是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最可笑的是家庭中的学习会，在权威家长的领颂下，全家人从背诵毛泽东最新指示“毛主席老人家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开始，然后再各自检查私心杂念。

后来发明了“忠字舞”，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男女老少都跳起了舞，其场景犹如图腾现场。

每一次发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单位就纷纷游行庆祝。后来有了规律，都安排在20时的“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在“最新指示”广播后，各路大游行都出现了，非常热闹。

毛泽东的普及文章是“副统帅”林彪所说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林彪认为：“‘老三篇’不但战士需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懂，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这一段话谱成曲后的歌，我现在还可以唱出来。毛泽东的四篇哲学文章是《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另一篇我已经忘却的文章。

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是由林彪创新的“活学活用”论。林彪指示说，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要“活

学活用、学用一致、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这个导向下，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一名不识字的叫顾阿桃的农村妇女居然能够用手绘的草图来进行“无文字报告”，汇报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就如一首交响曲，它的第一主题是“乱”，第二主题是“收”，两个主题交替出现，但是这场交响曲演奏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一共10年。

（时代录音）1966年的一首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毛主席语录歌》，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每次斗争会之前，基调就已经这样定下了。暴烈行动在次年得以全面而充分的印证。

◇ 1967年的夺权和惊心动魄的武斗

1967年的1月被称为“一月风暴”，这是指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政权。由中央派出的张春桥、姚文元到了上海。张、姚推出成立“上海公社”的方案，后来被毛泽东否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市革会，这个图章也用了好几年，各级组织也就都是“革命委员会”。以后，“王、张、江、姚”（上海国棉十八厂的保卫科王洪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称为“四人帮”，也有人称“上海帮”。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后是除了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为此纪念的，因为漏了台湾省而成为错票，后来出现了天价。

这样，上海的各级政权也开始由造反派来夺取。在我们学校被夺权以后，我被红卫兵组织作为笔杆子使用，开始使用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包，俨然是干部的打扮了，自我感觉非常好。

在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组织，各种组织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发生了权力的争夺，开始是“文斗”，打文字仗，因为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升级为“武斗”。开始的武斗是针对“牛鬼蛇神”的，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指示不但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而且还没有“一句顶一句”。学校的武斗还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工厂问题就大了，工厂可以生产各种武斗工具，有的工厂还能够生产新式武器，其武斗就非常惨烈。

派别斗争还波及到了家庭，有的夫妻双方各支持对立的一派而关系紧张，原则性强的甚至分离。

上海和北京的情况有明显差别，北京是学生力量强，而上海是工人力量强。上海先是出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后来又分裂了其他组织。出名的“工人领袖”有王洪文（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阿大、耿金章等，女性有王秀珍（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陈阿大以粗鲁而闻名于上海，“标点符号（类似国骂的话）”多，人称“阿大”。当时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是模仿陈阿大的讲话：“现在要为大家发枪，一人一支枪（众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支枪（众又鼓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枪（众还是鼓掌），是可能的（众大鼓掌），不过是木枪。”

上海曾经发生一些著名劳动模范联名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北京红卫兵围攻中共上海市委、干扰工作是错误的，其中我记得的有纺织工人杨秀珍、裔式娟；码头工人杨怀远等，但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后来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因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派工人赴京上访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此事惊动北京，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上海处理。张、姚在上海大力支持工人，使上海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拉拢了一些组织，但是没有把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学习好，有的组织不满。因而，上海先后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其中复旦大学的有才气的“红革会”打冲锋，可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复旦大学曾经扣留张春桥的“笔杆子”、“材料袋”徐景贤，徐景贤是领导“丁学雷”、“石一歌”的人物（“石一歌”现在因为对某人的争议而被大家知晓），是主流派笔杆子的头面人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因此被民间称为“徐老三”。红革会的头头名叫赵基会，听说红革会的人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时都“见到了颜色”。复旦大学现在还有一位教师胡守钧，当时笔名“孙悟空”，受过迫害。

在基层企业的派别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上级的支持。在锦江饭店，发生过“张春桥被扣”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我们公司下面的企业，我把有心人记载下来的现场情况保留了下来。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革”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情，外界鲜为人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8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30岁，原来是锦江饭店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8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张、姚正忙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过了几个钟头，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8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8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

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9楼，电梯门“咔嚓”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往下开，而是往上开到9楼，强要张、姚同意接见。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在9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它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脸孔胀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

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乎乎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28分钟。

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也怕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们赶紧把徐景贤找来，告诉他必须派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

到了1968年9月11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患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

上海最著名的武斗是1967年8月4日的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被专门称为“8.4行动”。上海柴油机厂的一派是市里支持的“上柴东方红”，另一派是工厂里占多数的“上柴联司”。“东方红”曾经将“‘上柴联司’打死解福喜的宣传单贴遍了全市”。因为“东方红”受到上层的支持，上海许多打抱不平的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简称“支联站”。由于斗争激烈，全上海也分成了相应的两派，大家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剧烈辩论。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人造反总队”头头王洪文（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授权陈阿大率领大军、带着摄影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听说张春桥、姚文元也都幕后关注着这场武斗的进展情况，因为这关系到上海夺权以后的稳定问题。

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骇人听闻，武器不断升级，中国简直成了内战，最后，由军队出场“支持左派”，简称“支左”。

这年还发生了半个世纪里上海最缺德的一幕。在上海市的北面闸北区，曾经有过三个安息地。现在的江杨南路、场中路、汾西路一带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墓地之一广肇山庄，最初建于清同治11年即1872年，占地300亩，在1949年时占地已达千亩，现在这里是楼盘的一部分。现在的共和新路、广中路一带也是有名的墓地联义山庄，最初是林姓广东富商的私家坟地，后来由粤商联合会购地后扩展到400多亩，现在已经被楼盘、邮局、学校、饭店所代替。这里开始是广东人的集中安息地，以后不少本地富人和名人也来此择穴，如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父母、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家属、电影明星阮玲玉等。还有普善路因为曾经有过普善山庄而得名，普善山庄是收放路尸的地方，在8·13抗日期间，轰炸日本军舰的飞机返航中炸弹误炸了“大世界”游乐场旁边，死者都葬于普善山庄。

1967年1月，在“破四旧”达到登峰造极的浪潮中，上海的墓地也未能幸免，十之八、九被毁，后来只能平整。其实当时参与者并不是“破四旧”，而是抢夺坟墓中的财富。中国的传统是很重视厚葬的，也很看重风水宝地，“掘祖坟”是大逆不道和奇耻大辱的。不过，坟地占地太多，势必导致活人和死人对土地的争夺，也许是海葬、树葬等形式更加科学和文明呢。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父亲、“中国四大家属”之一的宋子文在上海的墓地得以保全。

在混乱中，我成了“逍遥派”（当时专指不参与派别斗争的人），在学校的一架钢琴上弹起钢琴来。

（时代录音）1967年的一首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是死得其所。”（《毛主席语录歌》，出自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当年武斗的时候，这首歌是双方的精神支柱。

◇ 1968年产生的“老三届”和学生不同的命运

在1968年的时候，我在无聊中学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请一位曾经当过铁道文工团指挥的先生为我纠正姿势，当时做老师是不肯收学生任何东西的。后来这位老师无法招架越来越多的学生，只能一概都不教了。姿势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姿势是实现理想演奏的前提。在老师以外，其次是教材。当时书店里没有任何五线谱，有的人甚至用钢琴去换钢琴谱。有人设法从香港买来了《霍曼》和《开塞》，我记得是6元。我既没有钢琴、又没有香港购买的办法，只能手写抄谱。拉琴的时间倒是有的，问题是初学时发声难听，于是用上了弱音器。

“文化大革命”的交响曲在1968年进入了“第二主题”即“收”的主题。1968年的旋律是“三结合”和“复课闹革命”。“三结合”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毛泽东思想军宣队”或称“支左部队”结合起来掌握政权，这是在地方政府；在基层单位，则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农宣队”）代替“军宣队”参加“三结合”班子。“复课闹革命”是要学生回到课堂上课。

但是学生在夏天前就开始为自己的毕业分配而担心。

上世纪有名的“老三届”学生就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高中、

初中生。其中66届和67届是在1968年12月20日以前分配工作的，而68届是12月20日以后分配的，这一天就是天壤之别了。

12月20日晚上，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人，把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农村的同志也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一共执行了10年，可以说涉及到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家庭，10年后的情况后面再提。

66届和67届的学生分配是“根据情况”暗箱操作的。去处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工矿”还有“外工”和“内工”之分，“外工”是指外地的工厂。如果兄弟姐妹中有上海工厂工作的，那么就要去农村了，有的兄弟姐妹相互谦让很感人。这两届学生去的农村绝大部分都是国营农场，有很少的学生去“投亲插队入户”，就是去有亲属的地方当农民，但是如果当地农村收成好，则当地也不希望增加人。以后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投亲插队的就难于回城了，有不少是采取顶替父母退休而进入企业单位或事业单位的。如果与当地入结婚就更难回城了，也有离婚后回城的。68届的学生就无缘工厂和上海的国营农场了，全部去农村插队落户或者是边疆的军垦农场，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辛苦。上海68届多数去了云南军垦农场。在2005年2月鸡年春节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一个动人故事，一位黑龙江姑娘信守诺言、一直等着返城的上海知识青年完婚。上海青年起先辜负了姑娘，不过当他在许久以后知道情况后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他一再对姑娘说：“你怎么这样傻呀！”这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爱情故事。在那个年代，城市户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等生活必需品。

在1968年的夏天，街上出现了穿工厂工作服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幸运儿，而其中属于仪表局的则更是幸运中的幸运，谁知道到20世纪90年代的仪表局几乎是全行业亏损，直到20世纪末才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那时进工厂如果学技术当学徒是每月18元工资，如果是没有技术的熟练工则是30元5毛，半年后转正为36元。36元的月工资经历了许多年份，当时有“36元万岁”之称。如果是分到航道局之类需要船上生活的，则另外有津贴，加起来可以达到56元，所以是收入最高的。在工厂福利方面，有“大劳保”和“小劳保”之分，“大劳保”是本人医药费全部报销外还可以负担一个直系亲属报销一半医药费，而“小劳保”只是本人享受医药费报销。我偶尔抽抽烟，当时最好的牡丹牌（上海人称为“红壳子”）是四毛九分一包；中档的大前门是三毛五分包；飞马牌是二毛八分包；勇士牌好象是一毛一分一包；最便宜的生产牌是八分包。凤凰牌是新产品，旁边的人能够闻到一股话梅味。当时的上海牌手表全钢是120元，半钢是80元，一只手表相当4个月的工资。那时的“三大件”是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一年的纺织工业出现了名叫“的确凉”的衣料，其实是棉涤，全身的面涤服装加上手表就是顶级的打扮了。

这是一个经济上基本平等的时代，工资高2块是了不起的拔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现任全国人大主席、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邦国家里还没有卫生设备，被称为“拎马桶市长”。顺便提一下，那时已经取消了稿费制度，人们写作完全是为了兴趣和自我实现，这在现在也是不易做到的。在如今贫富悬殊的现状下，我们对那个时代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很幸运，就是在1968年12月20日，我作为67届高中生去了分配在属于上海市宝山县、而处长江口的长兴岛上的前卫农场三场果园。当天晚上，当大家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而得知自己是最后一批国营农场分配时，简直要三呼万岁了。

农场的工资是18元，这就是工农差别所在了。我们的三场原来是华东机关事务管理局办

的，是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那时有华东第一任保卫科长、华东交际处处长等。我们后来才知道现有的干部中犯“生活错误”（特指男女两性关系）的比较多。

1968年的学生工作分配为所有的知识青年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动一课，你曾经很出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最要紧的还是你现在的经济地位，当你在为基本的生计忙碌的时候，以前的权力和名气也一文不值；无论是黑格尔、贝多芬还是莎士比亚再现，你都将失去兴趣；当你还在为挣钱发愁甚至还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的时候，甚至连爱情也会黯然失色。但是，上海青年过于讲究实惠的庸俗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身为上海人，当时也对那些只关心自己利益、不过问政治、艺术的大多数上海青年相当鄙视。

1969年元旦来临了，我们刚到农场10天的同学们纷纷迫不及待地乘车到长兴岛凤凰镇码头去坐船回上海吴淞码头回家度假了。凤凰镇的白切羊肉很好，大约是一块九毛一斤吧，我买了一斤去孝顺父母。

这一年我们的出版社不知何故新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名为《天演论》），我马上买了一本仔细看了起来。我至今还纳闷，为什么当时要出版宣传“适者生存”的书。后来我知道美国的学校是把《圣经》和《进化论》都作为“未经证实的科学”来教授的。

（时代录音）1968年的一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这首歌里，融入了我的人生经历。

~~~~~

## 【研究报告】

### “文化大革命”中“三结合”的台前幕后

• 关海庭 •

“三结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领导机构内部人员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化，在中国领导体制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对“三结合”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再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其产生及演变的社会原因，希望能为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 ◇ “三结合”：全面夺权的产物

“三结合”是1967年全面夺权的产物。1967年1月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夺权。

1月12日，山西省各造反派联合行动，占领了省、市领导机关。1月31日晚，个别省级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2000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接管省、市委的领导权。在1967年1月23日以前，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群众组织代表和少量的革命干部代表两部分人组成。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构成之一。1月25日，《人民日报》就山西省夺权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社论

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显然，社论已经突出了这三方面力量的作用，说明这三方面的代表将在新的政权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上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由上述三部分人组成。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派革命委员会”。

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这一特定的术语。7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没有署名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文章在叙述了“三结合”夺权的经过后指出，黑龙江省的基本经验是：“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10日，《黑龙江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又将这篇文章加上“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派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的署名，并稍加改动同时重新发展和转载。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赞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经验好得很。这样，就把“三结合”作为黑龙江省夺权的一个基本经验向全国推广。2月17日和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革命的“一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两篇社论。其中心议题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这是夺权斗争的基本保证，是实行夺权的正确方针。

“三结合”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扩展很快，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 ◇ 何谓“三结合”

全面夺权后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采用“三结合”的形式呢？

“三结合”的结合之一，就是革命干部的代表。把革命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是基于当时对干部队伍的矛盾认识。在全面夺权刚开始时，196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对干部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方时，强调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但还是认为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也感到以前对干部队伍的估计过于严重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开始强调革命干部的作用。因此，在新成立的政权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但是，在“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干部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结合”的结合之二，就是革命群众的代表，又叫做“左”派或造反派的代表《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毛泽东之所以要把“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就在于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打倒“走资派”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对“左”派定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实际上人们往往是根据某个偶然事件，比如是否最先起来造反，是否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个人有联系，是否打倒了某个“走资派”等等，来判别某些人是否是“左”派。正像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这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这种群众代表产生的方式是极不合理和不正常的，它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曲解和破坏。首先，革命群众代表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程序产生的。从革命群众代表这个概念的形式上看，主要是指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而在当时谁都可以拉起一面大旗，成立某个组织。这就为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掌握权力造成了可乘之机。其次，革命群众代表出现后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极坏的。因为没有判别“左”派的明确标准，也就没有判别右派的明确界限。有的群众是“左”派，那么有的群众就会被打成右派；有的群众是“造反派”，有的群众就会被打成“保皇派”，从而加剧了群众内部的分裂和对立。

“三结合”的结合之三，就是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的代表。从1967年1月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夺权斗争以来，军队代表不但做为三结合之一参加了革命委员会，而且还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先后成立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有二分之一强的省份由部队代表担任“一把手”；第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由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机关批准。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组合发出文件，规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这种特殊的领导关系，也直接决定了军队代表在地方的地位。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缓和紧张的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支左”工作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失误，带来消极的后果。

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后，三者之间怎样有机地结合，哪部分人在政权内部居于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唯有《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社论要求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是较为具体的，其他都是笼统的。而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来中央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要求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革命干部的作用才开始显露出来。至于“革命群众”代表，由于他们本来就不是经过群众的正常选举而担任领导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很难开展工作。

#### ◇ “三结合”的“扩展”和“变形”

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体制，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

首先，“三结合”作为领导机构的组成形式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从量的覆盖面上，这种“三结合”不仅逐步扩展成为既是省以下各级政权的组成形式，而且又是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成形式。从质的内涵上，“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组织机构，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形式是：在各级政府机构，是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由民兵代

表代替解放军代表。在工厂企业中，是由革命干部代表、民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在各大中专学校，是由革命学生代表、革命教职员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后来，随着军队支“左”范围的扩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代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便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当时，组建这种三结合，强调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增加群众代表比例的途径，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就多数省、市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来看，三方面的比例大体如下：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群众代表）一般占50%左右，军队代表占20%，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20%，其他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占10%。在群众代表中，工、农、红卫兵的代表也有一定比例。一般的情况是，工人代表比例较大，贫下中农代表次之，红卫兵代表又次之。例如江苏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为：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其中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1%，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军队代表30名，占18.2%，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在省、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军、干、群三方面的比例与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比例大致相同。

后来，这种“三结合”的形式在教育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1968年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人组成“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决定“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学校”。同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际上，学校中的工人、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三结合”，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增加了工人代表。学校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既包括了一些群众代表，也包括了一些革命干部代表。

此外，这种“三结合”还发展成为领导机构运行过程中实行有效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1969年7月1日，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题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的调查报告，在总结斗、批、改的经验时说到：“工人阶级掌握技术大权后，建立了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新产品试制、设备维修、新工艺的制定，都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进行。各车间普遍建立了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

“三结合”的侧重点是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方式要同群众、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几种三结合，其出发点也是要使领导机关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和联系实际，这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主体。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毛泽东强调，人民在争得主人地位的过程中，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和各种错误思想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核心，才能真正实现由国家权力客体地位上升到国家权力主体地位的转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如他概括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而当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体以后，也不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国家官员，都必须直接从事国家的政治管理，而是指少数人的执政是在大多数人的真正同意和委托之下进行的。这时代表人民利益的“精华”，主要表现为国家各级干

部。正因为社会还不能完全执行管理时，大多数人才委托这些少数干部来进行管理。为此，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的：其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二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到了晚年，他把这两个矛盾合二为一，把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也纳入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矛盾体系中去了，认为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矛盾在党内和国家政权内的反映。毛泽东之所以极力反对官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官僚主义的膨胀，会使人民群众争得来的权力丧失掉。毛泽东曾说：“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毕生都在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进行着斗争。从1944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习，引以为戒，到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以至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60年代，毛泽东领导了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但是对解决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起了一定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各级领导班子实行“革命”，建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机构，以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形势和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认为自己有责任带领群众向新的敌人即官僚主义进行生死斗争，使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毛泽东认为这样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而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 ◇ 新的“三结合”原则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部队的“三支二军”问题。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二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要求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此后，大部分参加到“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陆续返回部队，但也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主要是在省市一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不久，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至此，“革命委员会”中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便不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而代之以老中青三结合的新形式。

实际上，老中青“三结合”形式，在此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要求，九大代表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1970年3月5日，经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的北京大学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提出在基层建立的党支部，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1971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指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但是，这时的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指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同“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相比，还没有作为普遍原则提出来。直到1973年1月1日的“二报一刊”社论发表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才正式被确定为各级领导班子组成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原来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军队代表的“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还没有全部解放，因此，最初的老中青三结合过分强调了青年干部的作用，忽视或在一定

程度上排斥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作用。比如开始组建领导班子，有严格的年龄标准。1973年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行组建。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给予了肯定，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建，但同时强调“老中青三结合，以中为主”，中青年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否定了“火箭式”的提拔，这就使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使其纳入正确的轨道。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当做右倾翻案风被加以批判。

老中青三结合领导体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为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领导机构正确的组成规律。从其性质上说，属于年龄结构范畴，是指一个领导集体中不同年龄成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科学的领导班子，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组合。在不同角度中，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是领导群体结构中最重要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群体效能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领导集体其他科学结构形成的基础。因为年龄不仅是一个人生理功能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知识经验积累的多寡、智力发挥程度的标志。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可以为领导集体横向最佳结构的形成打下基础。

此外，从领导集体纵向的发展上来看，老中青“三结合”还可以保证领导班子发展的连续性，不致于使领导集体在一定时期因为年龄原因大起大落。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并没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原则，这是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严格区别开来的一个明显标志。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